



百年追憶

評林衡哲《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學系助理教授
蕭義玲



廿世紀
台灣代表性人物（上）
林衡哲主編
望春風文化 / 9004
ISBN 9573045730 / 平裝

林衡哲先生（本名林哲雄，林衡哲為其筆名）花費十餘年的時間心血編著《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上）一書。提到林衡哲，熟悉臺灣文化論述者大約不會對這個名字太陌生，因為專事臺灣本土文化書籍的「新臺灣文庫」就是由他主編的。在這之前，林衡哲對臺灣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在於創辦了專門譯介西方文學、思想專著的「新潮文庫」，在臺灣歷經戒嚴時期那一代知識份子的成長經驗中，「新潮文庫」一直是青年們接觸吸數西方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從面向西方的「新潮文庫」到回歸本土的「新臺灣文庫」，正好標誌著林衡哲個人身分認同的轉換，更記錄了臺灣當代思潮的變遷。就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這是頗為重要的現象。

首先就個人身分認同的變化，林衡哲坦言：

我的本行雖是醫生，但是二十多年來卻與出版事業結了不解之緣，在出國之前創辦新潮文庫時代，我因深受羅素、史懷哲、卡薩爾斯與愛因斯坦的影響，我覺得做中國人都太渺少了，想向上面四位傑出人物看齊，而希望做世界公民，離開故鄉來到美國之後，才發現只有MENTAL RETARDED的人，才有可能

變成世界公民，他們只要有吃有穿，住在同一個國家都一樣，而我們一般人是離不開自己的民族與文化傳統。在出國之前，我只知道有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存在，那時的我可以說是臺灣文化的文盲，根本不知道有多采多姿的臺灣文化的存在。

林衡哲於國族認同轉變的契機如上述引文所言，是發生在他離開臺灣到美國行醫以後，這個轉變契機完成於林衡哲對兩本關鍵性文本的閱讀後，對此，林衡哲在其日後的追憶中如此描寫：「我的文化上的臺灣意識經過《無花果》與《自由的滋味》的洗禮後，終於萌芽了。」（雕出臺灣文化之夢自序）我相信在林衡哲認同意識的轉變上面，這兩本書必然有著重要的地位，不過我們同時也必須反省到人類在事後追憶時總會強化某些關鍵性事件的記憶，提高其重要性或在事件中的比重，因此，我相信林衡哲的轉變應該是有一段長期的摸索歷程，可惜就現有的資料我們無法深入了解在這段轉變的過程中，林衡哲思想轉折的詳細情形。我認為這種國族認同的轉變，應該是研究當代臺灣份子國族認同的絕佳材料。

此處必須注意到的另一個地方是這種國族認同的轉換應該是被建構出來的，而不是一種「意識覺醒」（awakening）。因為「覺醒」意謂著對國族的認同意識從沈睡當中醒來，這個說法背後預設著國族是先天客觀的存在，只是暫時進沉睡狀態或被蒙蔽隱藏起來。事實上近代國族主義的論述大多放棄了國族是先天客觀存在的想法，一些重要的論者如葛爾納（Ernest Geller）、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大多同意國族是由國族主義建構出來的，亦即國族主義先於國族而存在，套句安德森著名的話：國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對「臺灣人」的身份認同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因此林衡哲的身分認同轉換，並不止於其個人的特殊生命經驗而已，實乃當代臺灣國族主義建構過程中一個典型的身分認同轉換。明乎此，我們才能避免掉入本質論式的國族主義論述陷阱中，同時才得以理解林衡哲在本書的時代位置。我使用「建構」二字並非在貶斥「臺灣人」此一身份認同是唯意志論的或虛假不實的，事實上對認同而言，是如同薩伊德 (Edward W.Said) 所指出的：「任何一種可區分開來的集體經驗的庫存，終究都是一種建構。」因此不管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或是「臺灣人」的身份認同都是被建構出來的。而這種意識的凝聚必須有賴於某些特殊的管道。

臺灣於二次大戰後的國族主義論述中，中國國族主義受到國家機器大力的支持，因而享有較優勢的發聲位置，得以透過教育體系與文學、思想、歷史各種領域形塑青年的國族認同。在這種情形下，戰後接受教育的知識青年在其認知中被殖入中國近代的歷史記憶，因此對於戰後成長的知識青年而言，他們自覺的歷史傳承乃是五四運動，在其記憶中的文化英雄乃是梁啟超、胡適，而非賴和、蔣渭水。在這種情形下，臺灣的歷史記憶於是發生斷層現象。上述種種大約是戒嚴時期成長的臺灣青年共同的文化背景。

林衡哲亦復如是，他說：「從初中時代開始我就熟讀梁啟超、胡適、林語堂的作品，加上國民黨十二年的所謂「中國文化」教育，在臺灣時，使我只見到中國之林而沒有見到臺灣之樹。」(雕出臺灣文化之夢自序) 在「新潮文庫」時期，我們實在可以看到極為濃烈的「五四」色彩。首先就「新潮」這個名字而言，任何對於中國近代歷中不陌生的人，馬上會聯想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新

潮社」所創辦的《新潮》雜誌。我不知道「新潮文庫」的名字由來是否意謂著繼承五四時期的《新潮》雜誌，不過其引介西方文化的目標，倒是與「新潮社」是相當一致的。

「新潮文庫」時期，林衡哲曾編著一本由 36 篇短篇傳記合成的書《廿世紀代表性人物》。在 21 世紀的開始，認同臺灣人身份的林衡哲另行編著《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從《廿世紀代表性人物》到《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其間理念的差異，頗可從其序言的結語看出，在《廿世紀代表性人物》中他說：

希望不久的將來，在各種精神領域的追求上，我們也有能力產生世界性的代表性人物，那時我才能把近百年來我們民族的「集體的自卑情緒」(COLLECTIVE INFERIORITY COMPLEX) 獲得真正的解除。

在《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中他則說：

從這些廿世紀臺灣代表性人物，我們知道臺灣已經有能力產生世界級的傑出人物，只是我們的教科書上很少提到他們。看完此書，將會使您以做臺灣人為榮，同時也把我們近百年來我們民族的「集體的自卑情緒」(COLLECTIVE INFERIORITY COMPLEX) 獲得真正的解除。

從這兩處表面類似的序言中我們得以獲知許多訊息，首先，即是二書的承繼關係。在《廿世紀代表性人物》當中他希望「我們民族」能產生世界性的代表性人物，俾便將民族「集體的自卑情結」一掃而空。接著在《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一書中，則認為此一目標已經達成，原因在於書中所臚列的臺灣代表性人物是真正世界級的臺灣代表性人物。從國族認同來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二書所提及的「我們民族」之實質內涵已經有所差別，前者意指「中國人」後者意指「臺灣人」，故從國族認同來看，二書之觀點發生斷裂。然而在下述意義上來說，二書存在極為強烈的觀念承繼。這個觀點的承繼在於一種對「世界公民」的認同，表面上在《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時期林衡哲已經回歸鄉土



認同臺灣，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其選擇臺灣代表性人物之標準，還是在於該人物能夠充任世界性的代表性人物，這點也是對於《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這本書提出與林衡哲先生商榷之處。

似乎林衡哲在編著此書時所擬定的代表性人物過於從「世界性」著眼，因而不免偏重在該代表性人物事功上之表現，實則在追索能夠代表「臺灣人」的人物時，我們應思索所依據的標準為何？是否在事業上成功傑出的表現即足以代表臺灣人？雖則國族主義在論述上常常有一種薩伊德所說的「英雄敘述」(heroic narratives) 傾向，然而我們更須記住歷史應該是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表彰歷史人物時，其內在精神的探索往往亦是重點，二千年前司馬遷寫作《史記》在為人物立傳時，即清楚意識此點，在列傳中事功傑出的代表性人物雖佔多數，但亦往往容納李廣、賈誼之類抑鬱不得志的人物。因此我認為在形塑廿世紀臺灣代表性人物時，或許應該打破追求事功的迷失，另尋標準，不以行業來區隔人物。對此，林衡哲其實一直有著一股清晰而強烈的願望，希望推動臺灣的「文藝復興」，因此他在望春風出版社的提詞中說：

我們必須抓緊流失的根，來推動當代臺灣人文主義的再生運動，以臺灣優先的精神，開創國際化人文本土化的臺灣新文化，並期待二十一世紀的臺灣，能邁向創造「文化奇蹟」之路，而成為二度文藝復興的發源地。

對於臺灣文化的熱愛與推動，是林衡哲予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地方。他提出「二度文藝復興」做為推動臺灣新文化的目標，本是扣緊臺灣人文主義的再生運動而說的，從此處觀來，似乎無可厚非。然而諸如「人文主義」、「文藝復興」等名詞在西方歷史上是有一定意涵與歷史背景的文化概念，並非一般語詞。因此當我們提出這些名詞作為行動目標時，不免引發如下之爭議，即何謂人文主義？臺灣曾經有過人文主義的傳統嗎？

事實上，在東亞的近代歷史上，提出類似口號者並非第一次。前述中國現代史上的《新潮》雜誌即是一例，《新潮》的英文名字為 Renaissance 正是「文藝復興」之意。「新潮社」諸人之所以要將雜誌名稱取作 Renaissance 殆與胡適推動的新文化運動有關，對於新文化運動胡適正是將之定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胡適的比附當然是一種誤殖，這點余英時等人已有定論。此處我們應當注意的是胡適為何執意以西方的「文藝復興」來稱呼當時推動的新文化運動？我想一方面固然是胡適並未對於他使用的概念作精確的思索，另一方面則是胡適不經意流露出一種對西化的渴慕。更重要的是近代當東亞文明與西方相遇之後，迅速喪失自我的信心，而呈現出一種被馴化的面目，一切的標準完任依照西方文化提供的標準重新設定。

就口號而言，我並不反對提倡「二度文藝復興」這樣的字眼，問題是我們是否對其間引用的術語或概念有一番深思熟慮精確的掌握？個人認為這一點恐怕是所有關心臺灣文化發展的人所必須嚴肅思考的課題。

本書在當代臺灣國族認同的形塑上，一方面擔負著重述中斷的歷史記憶的任務，故爾努力地復活一些幾被遺忘的人物如江文也、王井泉。另一方面亦欲激勵臺灣人對自我的信心與認同，故亦努力為臺灣當代一些活躍於其專業領域的人物作傳，這些都是耗費時日的苦功夫。透過這些傳記的編輯，我們彷彿得以看見編者的身影。作家苦苓曾經戲稱林衡哲醫師「傻瓜奶媽」，的確，他的理想主義使他投注了所有的時間、金錢，為臺灣文化的推展盡心盡力，在唯利是視的商業社會中，這必須是一個有崇高人文理想的人格才能堅持下去，在臺灣歷史的建構藍圖上，林衡哲亦必然有其重要的位置。在 21 世紀的開始，《廿世紀台灣代表性人物》的編成應可視為林衡哲醫師再一次哺育臺灣文化的美好成果。